

试论青铜觶的组合和墓葬的关系

曹 斌 徐紫瑾 侯宜斐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考古文博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青铜觶作为流行于晚商和西周前期的一类重要青铜酒器, 在酒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文结合出土铜觶和未出铜觶两类墓葬的情况, 对青铜觶的组合与墓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总结铜觶组合的同时, 揭示了组合变化与墓葬等级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 青铜觶; 组合; 墓葬等级; 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38(2016)01-0016-08

DOI:10.16140/j.cnki.ydxk.2016.01.004

青铜觶是流行于晚商和西周前期的一类重要青铜酒器, 在酒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多年来关于其组合问题尚无学者论述, 而铜器组合与墓葬等级的关系问题亦鲜有涉猎。但青铜觶的组合, 特别是组合与墓葬等级的关系问题, 对于讨论商周时期青铜酒器的核心组合及变化, 及其由此延伸的商周礼制和器用制度的变化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

关于商周时期墓葬等级的判断标准, 我们曾利用皮尔逊相关矩阵等分析方法对琉璃河和曲村墓地进行过数据分析, 指出判断墓葬等级的重要要素为墓葬规模、铜礼器数量和外椁的有无(特别前两者), 并结合文献指出墓道在等级判断中的特殊地位^[1]。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就为铜礼器中的一类, 因此拟据出土青铜觶的墓葬的面积、墓道和外椁的有无情况, 并参照同时期其他墓葬, 将出土青铜觶的墓葬划分为大、中、小型三个等级, 探讨青铜觶的组合与墓葬等级的关系。同时, 还将之与同时期不出青铜觶的墓葬中的酒器组合进行对比, 以期得出更加全面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 殉人的情况大量存在于商周时期, 但主要见于

以殷人为主体的族群集团, 因此殉人的多少不作为所有墓葬等级划分的依据, 仅为判断殷人集团墓葬的要素。而斗作为一种挹酒器, 多出于较高级别墓中, 应是酒器组合中重要的一员, 可与粗体觶配对, 舀取而饮^[2]。然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忽视, 我们在讨论酒器组合时, 也将之列入其中。由于本文需要探讨青铜觶的组合, 因此所选墓葬以完整、未被盗掘的为主。

一、青铜觶在大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出土青铜觶的大型墓, 墓室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 葬具为一椁重棺或一棺一椁, 有的带墓道及附葬车马坑。目前共发现 12 座, 属殷墟二期晚段的墓葬有小屯 M5。该墓为竖穴土坑墓, 墓葬面积 22.4 平方米, 出土青铜礼器 205 件, 有方形器多件, 并有箕形器等少见器型。其中觶 2 件, 1 件有盖^[3]。墓主妇好为商王武丁的配偶, 多次带兵出征, 身份显贵。所出铜器以酒器为主, 与殷人尚酒风气相符。食器组合为鼎、簋、甗, 酒器组合为罍、尊、卣、觚、爵、觶、鬯、觥、方彝、壶、盃、斗, 水器组合为盘、盂、罐, 酒器基本组合为觚、爵。觶开始出现于酒器组合之中, 但地位并不重要。妇

[收稿日期] 2015-11-25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青铜觶研究——考古学方法在铜器研究中的实践》(项目编号 16XNQ003) 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曹斌(1981-) 男, 博士、博士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先秦史。

好墓中出土 53 件觶 40 件爵,而觶仅 2 件。说明此时觶在组合中仅处于陪衬地位,这与刚出现不久有关。同时,大型墓仅妇好墓出土也说明觶还未广泛出现于大型墓的酒器组合之中。属西周初年的墓葬发现有 2 座,出土青铜觶以西周早期早段为主,亦有个别殷墟四期晚段器型。北京琉璃河 M1193 墓室面积在 40 平方米左右,在墓室四脚还各有一条墓道。墓葬虽被盗,仍出土壘 1 件、盃 1 件、带盖觶 1 件^[4]。其中克盃、克壘记匱侯克受封燕国之事,该墓也公认为第一代匱侯克之墓。河南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墓室面积达到了 50 平方米左右,两条墓道,殉人达 14 具,腰坑殉一人一狗。出土铜礼器 79 件,原始瓷 13 件^[5]。其中觶 5 件 2 件有盖,墓主一般认为是周初分封的诸侯。从以上两墓情况看,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鬲,酒器组合为罍、尊、卣、觶、爵(角)、觶、壘、觥、盃、斗,水器组合为壶、盘,酒器基本组合为觶、爵、觶、罍。从觶与爵、觶数量的对比来看,此时觶已普遍出现于大型墓的酒器组合之中,成为酒器基本组合之一。属西周早期晚段的有叶家山 M27 墓葬面积约 33 平方米,一棺一椁^[6]。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鬲,酒器组合为尊、卣、觶、爵、壘、觥、斗,水器只有盘。该墓一般认为是曾侯谏夫人之墓,酒器组合中有觥足见其重要地位,另外食器仍有甗也显示了诸侯一级墓葬保守的一面。墓中铜觶出土 4 件,其中 3 件无盖,1 件带盖,数量超过觶、爵,可见觶已成为酒器的核心组合,很可能地位已高于觶。属西周中期早段的墓有宝鸡茹家庄 BRM1 乙,墓葬面积 44.1 平方米,一椁重棺。乙椁室出土带盖觶 1 件,墓主为弓鱼国一代国君^[7]。从乙椁室出土礼器看,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鬲、豆,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壘、斗,水器组合为盘、壶,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无觶出土的现象,说明觶已取代觶,与爵形成稳定的组合。属西周中期晚段的墓葬有张家坡 M170 及北赵晋侯墓地 M33,可惜两墓均被盗,前者仅出土 1 件觶盖,后者出土觶又未作介绍,故也难以判断铜觶所属期段,器物组合亦无从判断。此外,大型墓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侯家庄商王陵之一的 M1400。该墓为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型,墓室面积达到了 252 平方米。虽然被盗,但南墓道出土有罍 1、尊 1、觶 4、爵 4、觶 1 件^[8]。对于该墓的时代,学界尚有争议。据出土的这件弦纹觶,我们推测该墓在殷墟四期的可能性较大。但是该觶出土

在墓道,并非墓室,且仅在圈足和颈部饰弦纹,以上都很难将之与商王直接联系。因此,由于商王陵被盗严重,周王陵至今尚未发现,铜觶是否在商王或周王一级的墓中有所出土,目前的考古材料尚难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只能根据流散至海外的部分精美的铜觶以及 M1400 南墓道以及同在侯家庄商王陵区的 M1022 有铜觶出土的情况判断,铜觶很可能存在于商王或周王一级的墓葬之中。

从以上分析可见,大型墓墓主属诸侯及其夫人或王室重臣(张家坡 M170)一级,亦有商王配偶,很可能还存在于商王或周王一级的墓葬中。这一级别的墓葬出土的青铜觶不多,这可能与大型墓本身数量较少,且被盗者居多有关。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开始,觶多为细体,这或许有时代的因素,因为从西周早期开始,圆口细体觶成为主流。大型墓礼器组合的另一个特点是器物数量较多,觶、爵、觶等器物常有多件,觶多有盖,且多方形器及一些少见器形,另外食器、水器均存在。这些都是墓葬等级高的表现,甚至在两周之际,明器组合仍部分地保留了这些特征。

二、青铜觶在中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我们将墓葬面积在 4—20 平方米之间,一般情况下具有外椁的墓葬定义为中型墓,即贵族墓葬。但通过对比观察,尤其通过同一墓地不同墓葬的分析,如北京琉璃河墓地 II M251 与 I M53,宝鸡弓鱼国墓地 BZM7 与 BZM8,天马一曲村墓地 M6210 与 M6121 的不同,我们发现,同为贵族墓,墓葬的等级和随葬品的数量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它们之间仍可做出区分。我们大致以墓葬面积 8 平方米作为界,将中型墓划分为两个等级。墓葬面积大致在 8 平方米以上的,称之为大贵族墓,8 平方米以下的,称为小贵族墓。当然,我们所选的数字并非严格的界限,商周时期的墓葬也不会以简单的一个尺寸作为等级的唯一标准。我们所选数字仅为一个大致参考,具体的还视同一墓地的墓葬规模、外椁及出土物的情况综合判断。

1. 青铜觶在大贵族墓葬中的组合

出土青铜觶的大贵族墓葬,面积一般在 8 平方米至 20 平方米之间,葬具为一棺一椁或一椁重棺。这一等级的墓葬最早的为郭家庄 M160,时代属殷墟三期晚段,下限或可晚至帝乙初年。出土青铜礼器 41 件,其中觶 1 件,有盖 9。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酒器组合为罍、尊、卣、觶、角或爵、

觶、鬯、斗,水器组合为盃、盘,酒器基本组合为觶、角(爵)、觶。此期墓仅发现一座。属殷墟四期的墓葬略有增加,有河南罗山天湖村 M6、山西灵石县旌介村 M1、河南安阳刘家庄北 M1046。食器组合为鼎、簋或加甗,酒器组合为尊、卣、觶、爵、觶或加甗、鬯,一些墓中有水器出土,组合为盃、盘,酒器基本组合为觶、爵、觶或加甗。所出粗体觶居多,带盖觶占到一半。从觶与觶、爵的数量对比看,觶在酒器基本组合中的地位仍较觶重要。西周早期早段墓有所增多,有宝鸡竹园沟 M4、山西曲村 M6081 和 M6210、泾阳高家堡 91SJGM4、宝鸡石鼓山 M3 等,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斗,个别加甗、觶。一些墓中有水器,组合为盘、壶,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有的墓中无爵,仅泾阳高家堡 91SJGM4 中有甗、觶,觶已取代觶的地位,与爵组成酒器基本组合,且粗体带盖觶占一定数量。从爵、觶的对比数量及出土比例看,觶在酒器组合中的地位已不低于爵。西周早期晚段墓葬有扶风齐家村 78FQM19、灵台白草坡 M1、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 I M52 和 II M253、山西曲村 M6231 等。所见食器组合为鼎、簋、甗或加甗,酒器组合为尊、卣、爵或角、觶,水器组合为盃、盘,或只出其中一件,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觶均为细体无盖觶,且已完全取代觶。西周中期出土青铜觶的墓多在偏早阶段,有山东黄县庄头村墓、山东高青陈庄 M27、河南鹤壁市庞村墓、长安斗门镇花园村 M15 和 M17、湖北江陵万城墓。食器组合为鼎、簋、甗或加甗,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水器组合为盃、盘或加壶,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粗体觶均带盖,但只占少数,其余均为细体无盖觶。需要说明的是,时代可能进入西周中期的翼城大河口 M1,虽墓葬面积只有 14 平米,但出土物中铜鼎一项就有 24 件,另外还有原始瓷、漆器以及匱侯旨铜卣等^[10],因此该墓的等级绝不会低。其铜器组合为鼎、簋、鬯、尊、卣、觶、爵、鬯、甗、盘、盃、单耳罐、斗,出土有爵 6、觶 8 件,其他酒器件数都很少,说明爵、觶是基本组合。同时 8 件都为细体觶,还有 1 件为椭圆带盖觶,说明细体觶在此时的高等级贵族墓中已成为绝对主导。但该墓仍有 1 件铜觶出土充分说明越是等级地位高,铜器组合就越加保守。与之相似还有绛县衡水 M1,该墓墓口面积只有 14.08 平方米,但是有一条墓道,且葬具为一椁二棺,出土鼎 5、簋 5、甗 1、鬯 1、觶 1、盃 2、壶 2、盘 2、孟 1 件^[11]。该墓时

代约相当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墓主邰伯即便不是诸侯,等级也只是略低。出土铜觶虽未介绍,但是酒器只有 1 件铜觶的现象说明其在铜器组合中的地位。此外,平顶山应国墓地 M84、M85 墓室面积仅略大于 10 平方米,葬具一棺一椁。M84 出土甗 1、鼎 2、盃 1、尊 1、卣 1、爵 1、觶 1、盘、盃 1 件, M85 出土鼎 3、簋 4、孟 1、尊 1、觶 1、盘 2、盃 2、豆形器 1 件,时代略晚于以上墓葬,报告认为两墓是一代应侯及夫人的墓^[12]。但无论是墓葬面积,亦或出土铜礼器数量都与时代接近的张家坡 M170、北赵晋侯墓地 M33 有一定差距,仅相当或略多于上述大贵族墓葬,故将其置于此处,具体原因还有待结合应国墓地的整体情况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8—20 平方米的中型墓基本属大贵族一级,只有个别等级相对较高。西周早期早段可作为一个分水岭,此后,爵、觶的酒器基本组合确立。这一等级墓中,出土青铜礼器数量仍较多。觶多为 2 件及以上,粗体觶较多,且带盖觶占出土青铜觶的近 1/3,还有扁方体觶的存在。另外食器组合一般均有出现,水器组合也常常发现于这些墓中。这些都表明墓主的身份等级较高,为大贵族一级。当然,应国墓地 M84、M85 说明墓葬规格在本类的,时代处于西周前、后期这一社会格局转变期的,或许也有诸侯及夫人一级的墓葬

2. 青铜觶在小贵族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出土青铜觶的小贵族墓葬,墓葬面积在 4 平方米至 8 平方米之间。一般一棺一椁,少数单棺。属这一等级殷墟二、三期的墓葬共发现 2 座,最早的为大司空 M539,时代属殷墟二期晚段,出土有箕形器。戚家庄东 M269,时代属殷墟三期早段。从以上两墓的出土情况大致可见,这一时期食器的组合为鼎、簋、甗,酒器组合为甗、尊、卣、觶、觶、鬯、斗或加甗,酒器基本组合为甗、觶、爵。觶与觶、爵相比,数量较少,处于陪衬地位,但所出 2 件均有盖。属殷墟四期的墓葬有安阳郭庄北 M6、刘家庄村北 M1 和 M9、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墓、安阳小屯村 82M1。食器组合为鼎、簋或加甗,酒器组合为尊、卣、觶、爵、觶或加甗、觶,酒器基本组合为觶、爵、觶或加甗。从数量看,觶的地位与觶逐渐接近,但仍有差距。所出觶中,粗体占半数,带盖的仅 1 件,与以上两等级墓相较,数量明显减少。属西周早期早段的墓葬有长安张家坡 M16、沔西张家坡 M106 和 M307、宝鸡弓鱼国墓地

BZM8、邢台市公园东侧 M28、山西曲村 M6069、泾阳高家堡 91SJGM2 等,数量较多,所出觶基本为细体无盖觶(平顶山 M242:5 带盖觶时代相当于此时)。除前掌大墓地外^[13],仅张家坡 M106、M2 两座墓出觶。食器组合为鼎、簋或加甗,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有的墓无尊或卣,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觶已完全取代觚的地位,与爵组成酒器基本组合。西周早期晚段墓葬有灵台白草坡 M2、扶风齐家村北 02ZQ II A3M4、洛阳东车站 M567、平顶山 M229、长安县河迪村墓等。所出觶均为细体无盖觶。食器组合一般为鼎、簋,个别加甗、鬲,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有的墓无卣,甚至爵,极个别墓仍有觚,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西周中期的墓葬发现较少,有山东济阳刘台子墓、湖北随县羊子山墓、长安沣西西户公路南侧墓。食器组合为鼎、簋,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有的墓中仅一类铜器,完整组合较少。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有的墓仅 1 件觶。

从以上分析可知,觶于西周早期早段基本取代觚的地位,与爵组成酒器基本组合,并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这一等级墓葬墓主的身份为小贵族,从殷墟四期开始,一些墓中仅有酒器而无食器。且一般情况下,墓中均无水器出现,这一现象可能与墓主身份等级有关。出完整食器组合,尤其出成套水器组合的,可能墓主身份、地位较高。从西周早期始,酒器组合开始逐渐不完整,说明酒器在礼器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这一等级墓葬出土礼器数量较上两级明显减少,组合中觶基本为 1 件,仅刘家庄村北 M9、平顶山 M242 出土 2 件。除刘家庄村北 M1、平顶山 M242 外,一般无盖。从以上分析可知,这一等级墓主身份较以上两类墓等级低。此外,粗体觶、带盖觶从殷墟四期开始较以上两等级墓有明显减少趋势,说明这两种觶可能较细体无盖觶地位尊贵。觶在小贵族墓中发现最多,可能与小贵族墓未遭盗掘,发现最多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觶自西周早期早段始广泛流行于此型墓中,尤其是细体觶的大量出现,说明觶的使用对象更加广泛,且有扩大的趋势。

三、青铜觶在小型墓葬中的组合关系

出土青铜觶的小型墓葬面积在 4 平方米以下,基本无外椁,墓主身份属末等贵族。这一等级的墓葬发现不多,最早的一座墓葬为殷墟西区 69AGM907,时代属殷墟三期,出土 2 件均为细体有盖觶^[14]。这一时期墓葬仅此一座,食器组合为

鼎、簋,酒器组合为罍、卣、觚、爵、觶、斗,酒器基本组合为罍、觚、爵。觶仅一座墓出土的现象,说明此时觶的使用还不广泛。但是与觚同为 2 件,说明地位已较殷墟二期有所提高。属殷墟四期的墓葬有殷墟西区 77AGM793、郭家庄 M53、郭家庄 M1、大司空村 53TSKM32。后两墓被盗,残存铜器无法反映组合情况。从前两座完整墓葬看,出土青铜礼器数量差别较大,郭家庄 M53 出土铜器较丰富,组合较完整。食器组合为鼎、簋、甗,酒器组合为罍、尊、卣、觚、爵、觶、觥,酒器基本组合为罍、觚、爵、觶。殷墟西区 77AGM793 出土铜器较少,酒器组合为觚、爵、觶,无食器出土^[15]。西周早期个别墓葬报道不清,给我们的判断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在麟游后坪村发现一窖藏,为 0.97×0.88 米的不规则方形,出土鼎 1 件、甗 1 件、尊 1 件、爵 1 件、盃 1 件、卣 3 件、觶 1 件、斗 1 件,组合似于墓葬^[16]。从中可见,酒器组合为尊、卣、爵、觶、盃、斗,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此外,前掌大墓地因商文化因素浓厚,M110、M13 的酒器组合仍为觚、爵、觶^[17],但小型墓中这种保守的组合形式基本只见于商系墓葬。西周早期晚段墓葬有扶风召李村一号墓^[18],食器仅 1 件鼎,酒器组合为卣、觶、壶,饮酒器仅 1 件觶。西周中期及以后墓葬未见发现。

由以上分析可知,小型墓中觶于殷墟三期出现于酒器组合之中,且地位略高于前三个等级的墓葬。殷墟四期在酒器组合中地位明显提高,并于西周早期早段与爵配对,成为酒器基本组合。至西周早期晚段酒器基本组合仅 1 件觶。这一等级墓葬出土礼器数量明显减少,除殷墟西区 69AGM907 出土 2 件带盖觶外,其余均为 1 件,基本以细体无盖觶为主,反映出这一等级墓葬为出土青铜觶墓葬中等级最低一级。由于小型墓级别较低,礼器组合并不完整,有的无食器,有的每类仅一件,一般均无水器。个别出土礼器相对丰富,组合完整(除水器外)者,可能与身份等级较低但财富积累较多有关。

四、其它墓葬的酒器组合

从以上出土青铜觶的墓葬分析可知,觶基本在西周早期取代了觚的地位,成为酒器基本组合的核心成员。那么,出土酒器而未出青铜觶的墓葬情况如何?觶在整个礼器组合中的地位究竟是如何转变的?我们试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一探讨。

1. 殷墟四期其它墓葬的酒器组合

殷墟四期的墓葬我们以殷墟发掘的墓葬为例,因为此时期殷墟所做工作较多,发现的铜礼器墓数量也最多,基本可以反映殷墟四期礼器组合的变化。此期目前发掘的完整未遭盗掘的铜礼器墓葬有33座,28座出土酒器^[19]。其中,大贵族墓1座,小贵族墓14座,末等贵族墓13座。未出觶的小贵族墓6座,占小贵族墓总数的42.9%,酒器组合有:尊、卣、壶、盃、斝、觚、爵(GM1713);尊、卣、斝、觚、爵(戚家庄东M63、GM269);尊、卣、觚、爵(戚家庄东M231、M235);觚、爵(GM1125)。酒器基本组合为觚、爵,且14座墓均出有觚、爵。有觚、爵、觶组合亦占到了57.1%,但除刘家庄北M9出土2件觶外,其余均为1件,而觚的数量多为2—3件。因此,在小贵族墓中,觚仍占有统治地位,是酒器组合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成员。但觚、爵、觶的酒器基本组合已出现,并占有超过半数的比例。在末等贵族中,未出觶的墓达到了10座,占到了小型墓总数的76.9%。而未出觚的墓仅2座,未出爵的墓2座,觚、爵地位同等重要。未出觶的墓葬酒器组合有:尊、卣、觚、爵(GM1015、GM263);尊、觚、卣(GM1135);觚、爵(82苗圃M41、GM1118、GM279、GM793);觚(91后岗M38);爵(87梅园庄M67、92东八里庄M6713)。可见,酒器基本组合为觚、爵,在出土礼器不丰富的小型墓中,觶是被舍弃的对象之一,但是出现的频率还是略高于尊、卣,且在与觚、爵的组合中,地位是平等的,为一觚一爵一觶的组合。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殷墟四期酒器的基本组合还是觚、爵,但是觶的地位已较殷墟二、三期明显提高,觚、爵、觶的组合已占一定比例,这在小贵族墓葬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总体而言,殷墟四期觚在酒器中的地位远高于觶。

2. 西周时期其它墓葬的酒器组合

西周时期,我们选取张家坡墓地、泾阳高家堡墓地、宝鸡弓鱼国墓的、洛阳北窑墓地、天马——曲村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为例。这些墓地所做考古工作较多,基本可反映西周时期墓葬铜器组合变化的情况。

张家坡墓地1983—1986年共发掘398座墓葬,时代由武王至宣幽时期^[20]。出土青铜酒器的墓葬共5座,时代最早的为康王时期。其中2座墓未出土铜觶,而整个墓地均未出铜觚。可见,从西周早期晚段始,觶已完全取代了觚的地位。泾阳高家堡墓地共发掘6座墓,4座出土青铜酒器,

时代从周初至康王时期^[21]。91SJGM3未出铜觶,觶仅91SJGM4一座出土,是与爵、觶组合,此墓为大贵族墓,时代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可见,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还有觚、爵、觶的组合,但已经是个别现象。宝鸡弓鱼国墓地共发掘25座墓,出土青铜酒器的8座,时代多在西周初年至西周中期早段^[22]。出土觚的墓葬仅2座,均为大贵族墓,时代都在西周早期晚段,且与觶同出。有1座墓未出觶,仅出土1件爵。觚、爵、觶的组合仅保留到西周早期晚段,且已是极少数现象。说明西周时期觚在酒器组合中的地位已远低于觶。天马一曲村墓地1980—1989年共发掘6次,清理西周、春秋墓641座^[23]。其中出土铜礼器的墓47座,仅出土酒器的7座,6座出土铜觶,时代均在西周早期。M6384未出铜觶,也是7座墓中唯一出土觚的,属小型墓。从盘上所饰分尾鸟纹以及陶鬲折沿的特点看,墓葬的时代可能已进入西周中期。但酒器组合为尊、卣、觚、爵,出土如此“复古”的酒器组合值得思考。洛阳北窑墓地共发掘西周早期墓116座,中期墓57座^[24]。由于整个墓地被盗严重,出土青铜酒器墓早、中期各3座,且均被盗。出土铜觶的墓5座,均与爵组合,整个墓地无觚出土。以上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揭示了觚、觶在西周早、中期的地位。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青铜酒器墓葬6座,时代在西周早期^[25]。6座墓均出觶,与爵组合,而无一座墓葬出土觚,反映觚在该墓地西周早期时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从以上6个西周时期的墓地情况可知,从西周早期早段始,在出土酒器的墓葬中,绝大多数都有觶出土,而出土觚者极少。觶在此时进入繁荣期,觚却开始衰落。在酒器基本组合中,爵、觶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觚、爵组合而不见觶的为个别现象。凡出土觚的,基本上均与爵、觶组合,但这种形式已居于次要地位。从墓葬等级看,出土觚的墓葬,多为大贵族墓,小型墓有1座,小贵族墓中均为爵、觶的组合。再结合殷墟四期小贵族墓葬的情况,可认为觶首先是在小贵族墓中取代了觚的地位。可见,在西周早期早段,觚、爵基本上完成了角色转化,觶代替了觚的地位,成为酒器基本组合中的核心成员。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将出土青铜觶的墓葬划分为三大等级、四个级别,并结合其它未出土觶的墓葬的情况,探讨了觶的组合问题。总体而言:

1. 酒器基本组合殷墟二、三期为觶、爵、斝,觶刚刚出现,在酒器组合中仅处于陪衬地位;殷墟四期为觶、爵或加觶,级别较高的墓中有斝,觶的地位有明显的提高,甚至在中型墓的酒器基本组合中已占有一定比例,但整体而言,觶依然无法动摇觶、爵在酒器基本组合中的核心地位;西周早期早段为爵、觶,个别加觶,大贵族墓中个别有斝,诸侯一级墓中均有斝;西周早期晚段基本为爵、觶的组合,小型墓中有的仅1件觶;西周中期是爵、觶或1件觶的组合。可见,在酒器基本组合中,斝基本上于殷墟四期末段消失,觶基本上于西周早期早段末消失,西周早期晚段以后,爵也开始逐渐消失。觶出现于殷墟一、二期,殷墟四期开始在酒器基本组合中地位逐渐重要。西周早期早段,基本确立在酒器基本组合中的核心地位,开始与爵成对出现,成为酒器基本组合,直到西周中期衰落。《礼记·礼器》曰“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觶,卑者举角”,“爵”、“觶”为“贵”为“尊”也体现出两者何以会成为西周早期酒器的核心组合。

2. 从墓葬等级分析,从殷墟四期开始,觶在中型墓葬的酒器组合中已占一定比例,特别在小贵族墓葬中,觶的地位明显提高,觶、爵、觶的组合已占到半数以上,且在与觶同出的情况下,地位与觶基本平等。西周早期早段开始,大、小型墓及中型墓中的大贵族墓葬部分仍有觶存在,而小贵族墓中多无觶存在,酒器基本组合为爵、觶。因此,我们认为觶可能首先于西周早期早段或略晚的小贵族墓葬中取代了觶^[26]。沔西张家坡发掘11座西周墓,在1961—1962年同时发掘的三座墓葬中^[27],M106时代相对较早,约在西周初年,其余两座M307、M404时代均在西周早期早段,三座均为小贵族墓。M106酒器基本组合为觶、爵、觶,M307、M404的酒器基本组合均为爵、觶。我们依此推测,觶取代觶,首先可能发生在西周王畿地区的小贵族墓中,且这种变化似乎在西周王畿地区更为明显。组合形式接下来发生变化的为小型墓及中型墓中的大贵族墓葬,整体变化可能略晚于小贵族墓,时代基本在西周早期早段或略晚,大型墓中觶取代觶地位的时代最晚,约在西周早期晚段。总体而言,高级别墓葬的组合形式比较保守,甚至在西周末期,觶已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在两周之际的大型墓中,仍有明器爵、觶,乃至加觶的组合。

3. 从数量上看,高级别墓葬组合中随葬礼器数量较多,尤其是觶、爵的数量。小贵族墓葬组合中器物的数量一般仅1件;大贵族墓葬组合中器物的数量多为每类2件及以上。诸侯一级墓葬中每类的数量更多,妇好墓中甚至出现斝12、觶53、爵40、觶2件这样的组合。一般情况下,诸侯一级墓葬中每类的数量远多于大贵族墓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每类的数量也在减少,如平顶山M84、M85,酒器均为1件。至西周晚期及春秋初期,大贵族墓葬中爵、觶数量也各为一件,小贵族及以下级别墓葬中已无觶存在,而诸侯一级墓葬明器组中仍有6件觶这样的情况存在,这是商周时期上层社会礼制保守的又一种体现。

4. 带盖觶多器体厚重^[28]、纹饰精美、制作精致(相对无盖觶而言),且多出于大型墓的酒器组合中,大贵族墓酒器组合中带盖觶的数量也占到出土觶的近三分之一强,而以下等级墓葬中则绝少出现。说明带盖觶在酒器组合中出现是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且身份越尊贵,带盖觶出现的比率越高。同时,带盖觶的存在也有一定的时代差异。诸侯及大贵族一级墓葬中,殷墟二期至西周中期均有带盖觶,而小贵族墓主要存在至于殷墟二至四期,西周早期目前仅平顶山M242一例,小型墓仅殷墟三期有一例。因此,身份等级越低的墓葬中,带盖觶消失得越早。

5. 从粗体觶与细体觶的出土数量比例看,一方面细体觶从西周早期开始大量兴盛,其中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礼制的变化。在殷商时期,粗体觶较多,而西周时期,细体觶大量流行,尤其是西周早期早段之后,椭圆口、圆口细体觶基本上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殷墟四期小贵族墓中,粗体觶较以上两等级墓明显减少,自西周早期早段始,小贵族墓中基本上是细体觶一统天下,但诸侯一级和大贵族墓中,粗体觶仍占一定比例的现象,说明粗体觶的使用阶层比较保守。当然,也可能与粗体觶可与斗配对,滔而饮食醴(甜酒)的西周礼制用法(建柶之礼)有关。小贵族墓从西周早期早段始大量出土细体觶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觶在西周时期使用的阶层更加广泛,已取代了觶的地位,成为酒器基本组合中的核心成员。

6. 方形器多出自等级较高的墓葬,扁方体觶也不例外。妇好墓中虽无扁方体青铜觶存在,却有一件扁方体石觶(M5:1321)。唯一一件科学发

掘的扁方体带盖青铜觶出自长安斗门镇花园村M17(M17:38),而该墓为中型大贵族墓。由于扁方体青铜觶多为传世品,这给我们的判断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结合出土情况可知,扁方体觶可能亦是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志之一。

7. 青铜觶在大、中、小型墓中均有出土,但它们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一般而言,青铜觶是贵族使用的礼器,墓主身份等级越高,出土数量越多,且有标志身份的带盖觶、扁方体觶等的出土。而在小型墓中,青铜觶的使用并不普遍,只有为数不多的墓葬有出土,数量多为1件,且使用时间仅从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晚段,延续时间较大、中型墓为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型墓墓葬面积较小,无外椁,只有极个别出土青铜礼器较丰富,许多从数量上甚至难以和一些小贵族墓葬相区分。特别是殷墟西区69AGM907,出土2件带盖青铜觶,这在小贵族墓葬中也是罕有的。或许,这与这些墓葬墓主身份等级较低,而较多的拥有财富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许,他们在死后受到了王室加封或赏赐礼器陪葬。因此,青铜觶应是较普遍地使用于大、中型墓葬中的一类酒器。

8. 我们在其他文章谈过,青铜觶是殷商文化的产物^[29],从西周早期始,青铜觶在小型墓中明显增多,但多出土象征一般身份等级的细体无盖觶的现象,似乎进一步证明,商周王朝更替引起了青铜觶流行式样的变化。在《尚书·酒诰》禁酒文化的影响下,更加简单实用的细体觶大量兴起,商文化传统的粗体觶数量锐减。同时,殷遗贵族的地位也大大降低。

综上,本文结合出土铜觶和未出铜觶两类墓葬的情况,对青铜觶的组合与墓葬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总体上看,铜觶从西周早期开始取代了觚的地位成为了酒器的基本组合之一,但是具体的情况,仍与墓葬的等级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商周王朝更替引起的礼制和器用制度的变化有关。《尚书·洛诰》云“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尚书大传》言:“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据文献,周人在周初可能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殷礼,这可能也是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及铜器不易区分的一个原因。大致在成王六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周王朝才开始有意识的排斥殷礼,施行周礼,这在铜器的酒器组合和铜觶组合变化

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反过来说,铜觶组合(包括细体觶的大量流行)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礼制变化引发的铜器器用制度的变化。总之,希望本文对于青铜觶组合和墓葬关系的讨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曹斌. 西周燕国的部族和社会等级. 待刊.
- [2]曹斌. 关于青铜觶的定名和器用问题[A].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北方民族研究(2)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 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90(1).
-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11).
- [7]卢连成, 胡智生. 宝鸡弓鱼国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 [8]梁思永, 高去寻. 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 1129 1400 1443 号大墓[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 [1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联合考古队. 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J]. 考古, 2011(7).
- [1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山西绛县衡水西周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06(8).
-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平顶山应国墓地 I [M]. 郑州: 象出版社, 2012.
- [13]曹斌. 前掌大墓地性质辨析[J]. 考古与文物, 2015, (2).
- [14]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 [15]齐泰定. 安阳出土的几件商代青铜器[J]. 考古, 1964(11).
- [16]麟游县博物馆. 陕西麟游县出土商周青铜器[J]. 考古, 1990(10).
-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8]扶风县文化馆等. 陕西扶风县召李村一号周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76(6).

(下转 33 页)

